

和平战略

—肯尼迪言論集—

〔美〕阿兰·内文斯編

北京編譯社譯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1年·北京

Senator John F. Kennedy
THE STRATEGY OF PEACE

Edited by Allan Nevins
Harper & Brothers, New York, 1960
根据紐約哈潑兄弟出版公司 1960 年英文版譯出

• 內部讀物 •

和平戰略

——肯尼迪言論集——

〔美〕阿蘭·內文斯編

北京編譯社譯

*

出版者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千面胡同 27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101 号

印刷者 北京新华印刷厂

經售者 新华书店內部發行組

定 价 每本(精)一元八角
(平)一元三角六分

*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張 $11\frac{3}{4}$ · (平)插頁 2 (精)插頁 4 · 字數 211,000

1961 年 3 月第 1 版 1961 年 9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統一書號 3003·589(3)

出版者說明

美国新总统約翰·菲茲吉拉德·肯尼迪 (John Fitzgerald Kennedy) 出身于美国馬薩諸塞州波士頓財閥的富豪家庭。他的父亲約瑟夫·肯尼迪靠投机倒把、买卖地产起家，是美国最大的富豪之一，1937年至1940年曾任駐英大使，是积极的亲希特勒分子。肯尼迪本人194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在美国海軍中工作，曾任南太平洋魚雷汽艇指揮官。1945年任国际新聞社記者。1946年当选为众議員，积极支持奴役西欧人民的“馬歇尔計劃”和矛头指向苏联的北大西洋侵略集团，并贊成“援助”蔣介石集团进行反人民內战。1952年当选为參議員，历任參議院劳工与公共福利委员会、政府活动委员会、行賄調查委员会、小企业特別委员会、劳資双方不正当活动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以及两院經濟委员会的委員。1957年参加外交委员会后，又先后担任国际組織事务小組委员会和非洲事务小組委员会的主席。在担任參議員期間，肯尼迪是麦卡錫主义的积极

支持者，是反劳工立法的急先锋，1959年曾起草比塔夫脱—哈特莱法更为反动的肯尼迪—欧文反劳工法案。1956年肯尼迪曾被提名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结果失败。从1957年起，他又积极准备参加总统竞选。到1960年7月正式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为止，肯尼迪发表了大量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讲演。本书所收入的言论，主要就是他在这一时期的讲演。

肯尼迪与艾森豪威尔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他们都和美国总统徽章上的那只“鹰”一样，一手拿橄榄枝，一手持箭。肯尼迪的唯一花样是进一步加紧施展帝国主义的两手。肯尼迪认为，目前美国面临的中心问题之一是由于苏联科学技术大大领先而形成的“导弹差距”，美国必须变本加厉地加紧扩军备战，预算不应限制军费而应服从扩军备战的需要。肯尼迪公然叫嚣，加速发展和生产“终极导弹”，改进美国的防务和警报系统，以备进行全面核战争；同时还要大力恢复和加强常规军备，以便随时伺机进行有限战争，即所谓“灌木林火式战争”。肯尼迪认为，目前美国面临的另一个中心问题是由于帝国主义残酷剥削和掠夺不发达国家而形成的日益扩大的“经济差

距”，美国政府不应只进行临时决定的、不够需要的“經濟援助”和另敲碎打的“文化交流”。肯尼迪鼓吹采取“和平战略”，重新打起“和平”的幌子进行长期性的、足够需要的經濟侵略和大胆而多样化的文化侵略，妄图以此控制不发达国家和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和平演变”。肯尼迪还揚言，美国可以同苏联在某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就某些問題达成協議，但是美国必須以“实力地位”作为談判的后盾。这就是美帝国主义的新头子肯尼迪对外政策的两手。

从1960年7月到11月，肯尼迪在竞选期間又发表了大量言論。这些言論的調子同本书实际上一脉相承。本书系按照問題的性質分类加以編輯，眉目还比較清楚，对于了解肯尼迪的对外政策有一定的帮助，因此我們特将本书譯出出版，供研究今后美国对外政策动向的同志参考。

本书編者阿兰·內文斯是美国的历史学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任“紐約晚邮报”和“民族”周刊的編輯，战后曾在美国駐英大使館任对外事务处主任。他写过不少傳記，曾为美国最大的石油財閥洛克菲勒和汽車大王福特吹噓，給他們写过傳記。本书也正是为了吹捧肯尼迪，作为竞

选运动中的宣傳品而編輯出版的。內文斯在书中作了不少令人作嘔的按語，絞尽腦汁为肯尼迪搽脂抹粉；为了保持原书面貌，这些按語一律根据原书譯出。由于肯尼迪在演讲中提到不少外国人名和事件，我們在书中也酌加了一些譯注。

原书譯出后，我們又收到一个版本，书中补入了1960年5月美国破坏四国政府首脑會議以后不久肯尼迪在美国參議院发表的一篇关于“十二点計劃”的演說，我們已譯出附于书后。

肯尼迪的“著作”，除了本书以外，還會写过两本书。一本是1940年肯尼迪在学生时代写的“英格兰为何沉睡”，这是为了替英国首相張伯倫的綏靖政策辯解而写的。另一本是1956年写的“勇敢人物小傳”，这本书在1957年曾获美国普利茲傳記文学奖。这是肯尼迪为他所景仰的人物写的一本傳記集，象臭名远揚的反劳工头子、美国參議員塔夫脫，就是这本书中的人物之一。肯尼迪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这两本书的內容也可窺見一斑。

1961年2月

过去太平盛世中那一套教条，在风雨飘摇的今天已经不合时宜。现在的局面是困难重重，我们必须随机应变。由于处境改变，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必须改变。我们必须解放我们自己。

——亚伯拉罕·林肯

目 录

序言.....	阿兰·内文斯教授	1
一、和平的可能性		14
1. 全球性的挑战		14
2. 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		22
3. 被奴役的国家		32
4. 核试验		39
5. 裁减军备		49
二、两个中心问题		58
6. 导弹差距		59
7. 经济差距		79
三、未见分晓的地区		93
8. 印度支那和越南		95
9. 阿尔及利亚		106
10. 波兰和东欧		133
11.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重建		157
12. 金门和馬祖		161
13. 中东		167
14. 以色列		185
15.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194
16. 拉丁美洲		207
17. 印度和中国		222

四、美国願意負起世界責任	248
18. 公民自由以及我們所需要的新見解	249
19. 苏联对美国教育的挑战	258
20. 黑人教育的新天地	268
21. 廢除忠誠宣誓	274
22. 我們时代的七个和平革命	279
23. 原子时代的常規軍隊	284
24. 世界公民：学者的責任.....	289
25. 促进世界和平的农业計劃	294
26. 被蝗虫吃光的车头	299
27. 我們符合任务的要求嗎？.....	308
五、同約翰·費希尔的討論	315

〔附〕 外交政策的新方案，十二点計劃	352
--------------------------	-----

序 言

一位坚信美国负有使命的人

有一次，格罗弗·克里夫兰^①大发牢骚说：“如果你沒有一定的主張，那末，当选或是再度当选，又有什么用途呢？”一个政府人員，不管他是市长、州长或是总统，都应该貫徹这个精神；他可以是一位像克里夫兰市的湯姆·L·約翰遜^②那样的市长，像伊利諾州的奧耳特格特^③那样的州长，或是像富兰克林·D·罗斯福那样的总统，他

① 斯蒂芬·格罗弗·克里夫兰 (Stephen Grover Cleveland, 1837—1908), 1885—1889 年和 1893—1897 年任美国总统。

——譯者

② 湯姆·L·約翰遜 (Tom Loftin Johnson, 1844—1911), 从 1901 年起連任四届美国克里夫兰市市长。对市政管理有所改革，被吹为“美国市政改革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譯者

③ 約翰·彼得·奧耳特格特 (John Peter Altgeld, 1847—1902), 1892—1896 年任美国伊利諾州州长，曾釋放过无政府主义者和抗議总统派联邦军队进入該州，被吹为“人权和非特权者的維護者”。——譯者

們不僅有一定的主張，而且早在我們有了共同目標之前，就有一定的主張了。在美國的政治生活中，立場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國家犯的一個錯誤就是，有一種太注重個人而太忽視政策和輿論的傾向；我們懶惰，我們喜歡隨波逐流，我們願意把裝腔作勢當作勇敢，把時髦話當作主意。這種傾向助長了我們歷史上盛行已久的競選演說的傳統風氣；這種傳統就是，只要一位政治領袖在演說時具備詹姆士·G·布萊恩^①的吸引力、昌西·M·迪普^②的瀟灑風度，或是西奧多·G·比爾波^③的動聽的雄辯詞令，那麼，縱使他言之無物，也沒有多大關係。這種傳統力量說明，為什麼美國出版的政治演講集寥寥無幾，而讀這種演講集的人更不多見。大部分的演說，既不值得出版，也不值一談。

幸而這種傳統的風氣已經改變了。在國會里發表為民請命的演說以討好選民，在競選運動中又侈談維護國家的利益，現在都吃不開了。約瑟夫·張伯倫有一次對

① 詹姆士·G·布萊恩 (James Gillespie Blaine, 1830—1893)，曾任美國眾議員、參議員多年，並在加爾菲爾德和哈里遜任總統時期擔任國務卿，對美國外交政策發生過一定影響。——譯者

② 昌西·M·迪普 (Chauncey Mitchell Depew, 1834—1928)，1899—1911年任美國參議員，以演說富有煽動性出名。——譯者

③ 西奧多·G·比爾波 (Theodore Gilmore Bilbo, 1877—1947)，1916年以後曾兩次擔任美國密士失必州州長，1935年至1947年任美國參議員。善於詞令，極力維護白種人优越論。——譯者

他的追隨者說：“你們年輕人的毛病是，對自己的演說下功夫不夠”。他這句話的意思是，必須採取堅決的立場，並用邏輯和事實來維護這個立場；溫斯頓·丘吉爾年輕時仿佛就是用实际行动來回答這種責備的，他說過，他的演說詞往往要親自改寫六遍。就在煽動性的競選演說盛行的時期，林肯還是老老實實地抓住了大多數政客特別避而不談的問題，以認真的態度為他所提出的解決方案申述理由。人民接受了他的決心，認為可以通過他的道路突破國家所面臨的困難。人民永遠會接受那種表現了才干的果斷、率直和熱誠的態度；我們的困難越多，人民的這種態度也越明朗。西奧多·羅斯福、埃利休·魯特^①、伍德羅·威爾遜以及弗蘭克林·D·羅斯福的演說，在他們那個時代都是黑暗中的火炬，今天仍然值得我們閱讀；他們確立了令人難忘的標準。今天，我們需要新的高舉火炬的人，我們很快就會找到這樣的人。在那些最有才能的人當中，有一位懷着少壯者的熱情和為之終身奮鬥的理想，在這本書中高舉他的指路明灯。

正當國內那種安於現狀和萎靡不振的情緒又一次令人不安地普遍起來的時候，這本書的出現就特別具有價值。這種情緒同高高在上的人那種悠悠閑閑和無精打采的態度始終一致；這種情緒是由於國家的繁榮而來

① 埃利休·魯特(Elihu Root, 1845—1937)，美國律師和政客，曾任西奧多·羅斯福的國防部長和國務卿，獲1912年諾貝爾和平獎金。——譯者

的——一种不平衡的繁荣、通货膨胀的繁荣，但又是能給千百万人制造寬心丸的繁荣。这个危机重重的共和国的实际情况，同那些懶人所想象的完全不同。实际情况是这样可怕，无怪乎参議員肯尼迪这本书中的迫切語調，听起来像警鐘一样了。

一个世紀以前，美国曾經瀕临災难的边緣，当时的局面是由于政治上随波逐流、懦弱无能和盲目自信所造成的，今天誰也不能担保，美国不会再一次瀕临災难的边緣。

今天，冷战更不容易减弱潜在热战的火势了；世界两大敌对陣营的武器愈堆愈高；突然发生爆炸的危險几乎同过去一样可怕；这种爆炸可能超过历史上最惨重的灾难。当我们高談西半球的团结是我们的实力的一种因素时，古巴、巴拿馬、玻利維亚和委內瑞拉却举行反美示威。我国的債台愈筑愈高。通货膨胀給收入固定、工資微薄的人民，帶上了愈来愈殘酷的桎梏。收支不平衡，国际貿易的收支情况非常严重，因而財政部长发表了警告性的演說，副国务卿也远涉重洋，要求其他国家立刻采取步驟以改善我們的境遇。国家的农业支出估計已超过六十亿美元，但农业問題依然沒有解决，而农业剩余产品的儲存总数已經接近一百亿美元。全国工业會議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經濟学家討論会，得出結論說，美国的工业增长率已經差不多降低到西方各大国最緩慢的地步。

这岂是一个安于現狀的时代！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

时代，一个需要認真思考和坚决行动的时代。这正是肯尼迪参議員力图說明的一点。

我們需要那些能够实现大目标的領袖。第一，他們應該喚醒那些負有义务的公民，使他們摆脱那种唯命是听和随波逐流的情緒，向他們說明，只有采取当机立断的行动，才能創造出美好的未来；第二，他們應該用积极的态度去討論我們的問題，至少應該用能够使人明了可能的解决办法的态度去討論我們的問題。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被遺忘的人”的演說和1932年的共和国俱乐部演說的中心目的，就在于傳布一种新的民族情緒，概述新的政治哲学。而艾德萊·E·史蒂文森在1956年发表的令人贊賞的演說，其主要目的則在于仔細分析具体問題，同时提出应付这些問題的方案，这些演說后来編輯成书以“新美国”为題出版。在本书中，肯尼迪参議員，經過周密的考虑，力图把人們原来那种情緒改变成一种更为奋发的和富于理想的情緒，并具体地探討我們所面临的紧迫形势和突破这种形势的最好道路。

任何企图使美国人养成一种新的民族情緒的尝试，都必须达到超过大多数人所想象的深度，必須深入到基本問題。在进行这种尝试时，肯尼迪参議員因为是一个政党的代表，所以做起来比較方便，而这个政党又是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D·罗斯福、哈里·S·杜魯門以及艾德萊·E·史蒂文森把自己的精神灌輸进去了的政党。我們常常听說，我国的两大政党基本上是相同的；

外国人也說，很难发现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不同的地方。这种說法是有几分道理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是两个由許多成分构成的混合性的組織，能把許多不同的集团調整得步調一致；这两个政党都是有錢人、小康人家和穷苦人家的政党，都是农民、工人和自由职业者的政党，都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的政党，都是急进派、稳健派和保守派的政党。这两个政党使全国統一，而不是使全国分裂。然而，哲学上的重要分歧显然是存在的。艾森豪威尔总統有一次說，他和他的政党主張“具有动力的保守主义”（“dynamic conservatism”）；而我們剛才提到的全部民主党領袖——包括肯尼迪参議員——一定会說，他們的政党拥护“具有动力的自由主义”（“dynamic liberalism”）。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所收入的演說始終沒有因为共和党主义或其領袖的漫罵而遭到損害。看来，两大政党的不同似乎具有三重含义。

第一，虽然两党都认为美国經濟应该稳步发展，但民主党人希望主要是通过增加消費者购买力的办法，也就是通过更高額的工資和更广泛的就业的办法，来实现这个目的。而共和党人則希望采取鼓励投資的步驟，也就是通过稅收政策和其他促成更大利潤和更大积累的措施，来达到这个目的。其次，虽然两大政党都主張維持和扩大罗斯福新政中主要的社会、經濟改革，但民主党人只願意适当地強調收支平衡、減少債務以及其他慎重的措施，以做到这一点。而另一方面，正如艾森豪威尔先生

在他的任期終結演說中所表明的，共和党人則願意一般地強調平衡收支、減少債務和穩妥的財政管理，來達到這個目的。因此，在滿足工农需要這方面，民主黨人就會採取比共和党人更快和更有力的步驟，而共和党人則只會採取慎重的——如果不是勉強的——行動。

第三，在某些方面，民主黨現在是一個比共和党更主張採取聯邦行動（Federal-action）的政黨，而共和党則比民主黨更喜欢把維護州的權利（States' Rights）這種說法，作為保守主義的擋箭牌——這樣做是與他們的历史任務背道而馳的。我們不妨公平地說，自從弗蘭克林·D·羅斯福以來，民主黨人一直珍視杰斐遜的理想，但卻按照漢密爾頓的理想辦事。^①這也就是說，在資助教育、住房和道路修建方面，在擴大社會保險方面，在減少最高工時和增加最低工資方面，民主黨人主要是依靠聯邦行動。而共和党人則願意保留大片的領域，由各州自行處理。在處理水利和水土保持方面，民主黨人也會比共和党人把更大的責任交給聯邦政府，而共和党人則像艾森豪威爾先生所反復說明的那樣，致力於私人企業、各州和

① 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和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 1707—1804），都是美國獨立運動的領袖。美國獨立後，曾分別擔任華盛頓總統的國務卿和財政部長（杰斐遜後來於 1801—1809 年任總統）。他們分別代表當時美國社會上民主和反動的两派政治勢力。杰斐遜是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積極維護者，主張在美國建立地方分權的聯邦制度。漢密爾頓主張集大權於聯邦政府（中央），由中央征收更多的賦稅。——譯者

联邦政府三者之间的活动的平衡。

这些就是两党在政治哲学方面的巨大分歧。尽管在说明上述各点的时候，必然会遇到许多保留和例外的情况，但这种分歧点肯定是存在的。不幸的是，这些有关原则的分歧点或是摆在国家面前的主要具体措施，最近一个时期都没有进行应有的彻底讨论。步履维艰的共和党领导人——也就是主要依靠幕僚出谋划策的总统——助长了那种安于现状和漠不关心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同具有大刀阔斧作风的人所作的分析是不相容的。史蒂文森先生曾经说过，他在1953年的最大的失望是，他没有能把问题摊开，和对方好好较量一番。“根据当时一般的舆论，我的对手把问题一脚踢开，倒是容易办到的，从政治上来说，这是很狡猾的。”肯尼迪先生的主要目的是消除这种漠不关心和安于现状的态度。他希望唤醒人民，使他们脱离那种危险的麻痹状态。有人说，何必发愁呢？炸弹还没有扔下来，委内瑞拉还没有共产主义化，破烂的校舍、不适当的公路、不周全的医药卫生计划，都可以顶一个时候。但是肯尼迪先生在本书中指出，人们为什么应该发愁。如果人们觉醒以后同他争吵，那也没有什么——让他们觉醒好了。

这本书集中讨论和平问题：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美国同斯大林主义以后的俄国的关系，裁减军备的希望，支援不发达国家的重要性以及使我们的影响深入北非、近东和俄国卫星国家的方法。我们原可以把肯尼迪先生有